

戴季陶先生與中山大學

鍾貢勛

伏病陳詞謀國忠藎

民國十三年，國父爲了適應當時革命環境和需要，除了進行國民黨的改組外，一面創辦革命軍骨幹黃埔軍校，建立革命軍。同時，並創辦廣東大學，要以該校學生做革命黨的骨幹，來宣揚主義，完成革命建國工作。前者由今 總統蔣公負責從籌備到創校建軍，後者則由鄒校長海濱先生（魯）負責。但不到一年，國父北上，旋即因病逝世。鄒海濱先生迫於政治環境離粵，是廣東大學內部最混亂的一段時期。校內教職員學生，派別分歧，情形複雜。有國民黨青年團，有西山會議派，有一士的「黨」，（是取英文 Stick 的音，意思是用手棒去打共產黨份子，其實每次在大禮堂開會或遊行時，共產黨黨員倒是很帶着手杖參加，而且舉棒打人的。）有中社，有共產黨青年團，還有正式的共產黨黨員和跨黨份子。「士的」黨和西山會議派算是極右派，中社是偏右的，國民黨青年團是偏左的，真是形形色色，無奇不有。各據形勢，幾乎天鬧風潮，鬧得天翻地覆，真正讀書的人少之又少。廣東大學在初創時期就遭遇到共匪的鬥爭破壞。鄒先生反共立場堅定，不稍假借，更遭蘇俄代表飽羅廷的痛恨，必欲去之而後快，所以鄒先生是創校不久就離開學校了。

總統手著「蘇俄在中國」內說：『共黨以「響導」週刊爲其機關報，並出版書刊，宣傳馬克

斯主義。一方面更滲透本黨的宣傳教育工作。共黨份子和同路人，用唯物論和階級鬥爭來曲解三民主義，才算「革命的思想」；反而指本黨黨員對三民主義的正確解釋爲「不革命」或「反革命」。最顯著的事件，就是排擠宣傳部長戴季陶，及青年部長鄒魯，致使其憤而離粵。」戴季陶（傳賢）先生是十三年六月被戴上「不革命」「反革命」兩頂帽子而辭去一切職務離粵的。

十五年元月，國民黨召開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對於反共最早最力的西山會議關係諸同志，均加以開除黨籍的處分。戴季陶先生於元月二十七日（是時尙未奉命接長廣東大學）有一封七頁信箋的親筆「伏病陳詞」，對於鄒海濱先生的被處以永遠開除黨籍，請求迅速特令通電停止執行，留待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平反。那封親筆長函有云：

「鄒同志之努力於實際的革命工作，其勳績固昭然炳存於民國之歷史。前年改組以後，其熱忱於黨務之進行，應爲粵中同志所皆承認。即就廣東大學而論，若無鄒同志之全力組織，則並此校而無之，遑論其他。」

這是筆者五十九年夏天在國民黨中央黨史會史庫內檔案中找出來第一手最珍貴的資料，而是五十九年以前戴先生和鄒先生的文存全集都未刊載，爲外人所不知道的。從這封信內，更看出戴鄒兩位先生相知之深，謀國之忠，尤其是對廣東大學的重視。所以創創時期是鄒海濱先生筆路藍縷，以啓山林；而建設工作的進行，是戴季陶先生和朱騷先生到校之後了。

戴季陶先生是十五年夏奉命接長廣東大學（後改中山大學），九月到粵，十月十七日就任委員長，十九年秋卸校長職務，整整四年。這時筆者正是由預科升入文科畢業的四年，親炙季陶先生的言論風采，見聞真切。三年前筆者又襄助陳伯稼先生編輯戴季陶文存三續編及墨蹟時，更接觸到若干有關中山大學的文件。舊夢重溫，當年往事，歷歷如在目前！茲承中外雜誌編者之囑特撰戴季陶先生與中大以就教於中外高明讀者。

戴季陶先生十三年離粵赴滬，迭向 國父陳詞；不願擔任國民黨中樞職務，只願負一個教育機關工作，這是他以後擔任中山大學校長的最早動機。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前，季陶先生方自川返滬，迭奉電催赴粵，廖仲愷先生又再度到滬迎候。季陶先生因違離 國父逾年，赴粵覆命爲不可少之行的，遂束裝就道。一全大會被選爲中央執行委員，一中全會被推爲中央常務委員、宣傳部長，又奉指派爲政治委員會委員。但於大會終了之日，便離粵回滬。三月間迫於 國父命令，同志的敦促，始赴粵就職。繼又兼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及大本營法制委員會委員長。其時粵中政治部主務糾紛，同時並作，尤以黨內共產非共產之疑忌，隨時隨地均可發現。季陶先生知道這是黨中不能同時相容的基本問題，但他還是苦口婆心居間調停，一面力勸老同志忍辱負重，盡力合作，首



民國二年戴傳賢先生偕夫人（右第二、三人）在日本與中日友好合影左第一人為吳鐵城。

先屏除部下猜疑排擠的原因。一面又向新加入國民黨之共產黨人進言，請其犧牲共產黨籍，完全做個純粹的國民黨員，使黨中不致同時有兩個中心，然後一切糾紛乃可解除，組織工作乃不至受無形之障礙！無如苦勸雙方，都毫無效果。不到幾月，又被排擠而去。以後三度至粵，而又三度離去，索居於上海和湖州兩地。直至國父北上，親筆開列隨員名單，有季陶先生在內，並批註由上海參加。季陶先生隨從經日本（國父在神戶講演「大亞洲主義」，季陶先生任翻譯）到天津，又復回滬。

奮袂登台斥鮑羅廷

十四年初，季陶先生聞國父入京就醫，立即北上侍疾。因痛心共產黨異說橫行，生心害政，流毒無窮。曾以體認三民主義淵源於古代正統思想，而直紹心傳見地，詳陳於國父病榻之前，請示可否以仰鑽所得，寫為文字問世，以正人心，而端趨向。國父聆悉之餘，嘉其認識正確，許以盡情傾吐。所以季陶先生五月在粵參加一屆三中全會後，就返滬理首著作，先後完成「孫文主義之哲學基礎」及「國民革命與中國國民黨」兩書。前者專寫國父思想，是承接堯舜禹湯以至孔孟而中絕的仁義道德思想，和國父主張的國民革命是聯合各階級以對付共產黨邪說，混亂是非。後者強調欲圖中國的生存，必先圖中國國民黨的生存；更須充分發揮國民黨生存必備的獨佔性、排他性

、統一性、支配性以揭破共產黨的陰謀竊竊，喚醒同志勿受愚分化。兩書出版以後，共產黨竊據國民黨偷天換日的陰險詭詐被揭破了，共產黨在消聲屏息兩三個月後，大舉發動反攻，以「不打倒戴季陶不能奪取國民黨政權」為口號。蘇俄顧問鮑羅廷更信言必致季陶先生於死地。在廣州發現共黨秘密文件中，有一項鮑羅廷的分析時事報告，認為共產黨當前敵人有五個魔鬼，季陶先生也是其中之一。戴先生的著作出版後，國內到處翻印，銷行數十萬冊，並有幾種外文翻譯，而在廣州，北京，武漢被焚的，亦有數萬冊之多。季陶先生於十四年十一月應林子超、鄒海濱（魯）諸先生之召，前往北京，議定二十三日在西山國父靈前舉行會議。十九日上午十時忽有暴徒數十人，各攜手杖木棍，湧至西山香雲旅舍，指季陶先生為共產黨，加以毆打。繼又擁至城內菜市胡同三七號國民黨同志俱樂部，脅迫不得與會。季陶先生遂於二十日日出京，以書面聲明，在一定主張下可以同意會議議決。數年前我在黨史會審查吳稚暉先生專檔卡片時，發現季陶先生在十一月廿三日寫給吳稚暉李石曾一封誠摯傷感的親筆長函，敘述共產黨之反動暴行，季陶先生於十二月十三日，宣佈解除一切職務，回至湖州。

回湖州後，亦時至上海，但絕不與聞外事。十五年元月，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季陶先生仍被選為中央執行委員，同時大會又予以警告，禁止三年內不得發表文字。但我查閱大會紀錄，僅載由大會令其猛省，不可再誤而已。季陶先生除發表長函，對大會處分，認為不得其平，不能接受外，又因奉中央電令赴粵，乃函呈中央辭去一切職務。略謂在湖州鄉間養病，因神經程度衰弱，失却奉職能力，醫云至少非完全靜休半年以上不能回復，請特別鑒宥，允予解除一切職務云。季陶先生春夏之交病魔纏擾，幾瀕於殆，八月以後始逐漸轉機。時政府已任命季陶先生為廣東大

學校長，並派中政會秘書長周柏年前往潮州促駕，學生曾派李翼中、陳紹賢、甘家驛等隨行。季陶先生續在潮州休養，直到九月中旬才去廣州，下榻周佩箴先生廬所。發表「受任廣東大學校長宣言」。

季陶先生到粵以後，看見學校裏共產黨徒滲透其間，猖獗異常，堅持不肯接事。經張靜江、譚祖菴兩先生竭力勸，於是向政府建議三事，(一)、大學必須改校長制為委員制，請以顧孟餘、經亨頤兩先生任正副委員長，而自願任委員之一。(二)、中山大學為中國革命的最高學府，今後中國之改造，所賴於中山大學者至大，吾黨所持之原則，在以黨建國，則大學政治訓育之必以黨化為原則，至無疑義。(三)、為鞏固中山大學之基本

，及發展中山大學之特色，有兩件大事。其一在財政上應由政府及黨中央共同負責，募集基金。其二除大學教育計劃之各科系外，應設立一個專院，兩個專局，即一、東方民族院。二、革命史料編纂局。三、中小學教科書編纂局。

中央接納季陶先生改校長為委員長制的意見，而不肯讓他置身事外，同時顧孟餘也堅辭不肯接受。因此，季陶先生又建議下令解散學校，由委員會負責整頓，教職員重新聘請，學生嚴加甄別。十五年十月初，政府特任戴季陶先生為中山大學委員長，顧孟餘副之，徐謙、丁惟汾、朱家驊等為委員。十月十七日，委員會成立就職典禮在大禮堂舉行，樓上樓下都坐滿站滿。走廊和禮堂內外，有很多生面孔，這是共產黨徒肆其



民國十三年十一月廿八日，戴傳賢先生隨侍國父在日
本神戶譯講大亞細亞主義時留影。

搞亂故技所特有的佈置，也是他們陰謀抑損季陶先生德望的計劃。果然，季陶先生訓話完畢，鮑羅廷及其黨徒相繼登臺大放厥詞。共產黨員是善於利用羣衆操縱會場的，所以鮑等尚未啓齒，四週就有掌聲發現，可是國民黨同志也應以嗚聲。季陶先生於是再度奮袂登臺，痛斥鮑等荒謬言論，詞鋒針對，犀利無前。聽衆掌聲迭起，踴躍歡呼，季陶先生在這種激動情緒下，雍容而退。

醫科可醫

法科有法

委員會成立委員就

職後，依照委員會議決各條，一一實施。由於委員中有幾位在中央另任重要職務，所以議決把日常校務，交由朱家驊先生全權負責處理。不過季陶先生還是忙裏抽空，天天到校，所有重要方針，都由其決定，他也已搬住百子路醫科內校長宿舍了。教職員重聘和學生的甄別，是當時兩大工作。關於教職員的重聘，是先經詳細調查，凡參加過糾紛的，一律停聘。當時教職員總數四百餘人，重聘的只有七十餘人。學生二千餘人，甄別後，淘汰了四百名。因適在學期中間，新聘的教職員不能立即到校，所以留下來的學生先開補習班，補習國英算三科，施以兩種訓育。這些措施，都是採用季陶先生建議的非常手段，雖經過不少困難，終究制服了共產黨徒的搗亂，視聽為之一新，學風於焉改正。自此以後，學生寄宿舍三層大樓，黃昏以後燈光瑩然，全體學生在燈下低首研習，迥異於未甄別之時了。惟學校經費困難，又遭遇難題。那時校中經費每月九萬餘元毫洋，實發兩成現款，其餘八成之中，六成公債，二成金庫券。市場上實價，金庫券是八折，公債是二折，全部經費只合四成八現款，等於毫洋四萬三千二百餘元。這四萬三千多元，季陶先生決定的原則，每月經常開支不得超過半數，其餘半數專充圖書儀器設備之用。季陶先生這樣勞碌幾月，原未完全康復之病體，不免因此復瘁。十二月間，朱驥先和周佩箴兩先生同陪前往香港療養，夜間坐省港輪渡前往，季陶先生忽有感覺而想蹈海，幸兩先生為之通宵看護。迨到港轉換環境，數日後精神好轉，始回至廣州。接奉蔣總司令介公電邀赴贛，遂安排校務，離粵赴滬，轉往江西而在廬山度歲。

十二月初，學生會成立，季陶有篇「中山大學前途講詞」，略謂：「我想把學校現在的狀況，同我們將來的進行，和各位談談。我們的學校，自從委員會各委員就職以來，有好幾十天了。



本文作者鍾者先(後中立者)國民十九年元月被選為中山大學學生會
常務委員與學生會其他負責人員許爾功、鄭守仁、陳協中等合影。

首先想對於同學生活上，有密切關係的一切整理起來。例如宿舍，實在太少，既不够住，並且也破壞得很，非大加整理修理不可，但需要一大筆費用。我們希望在今年幾個月內，圖書館、理科、醫科所必需的設備，都要趕快完全設置起來。關於教授問題，我們正設法羅置各地好教授。現在甄別考試，已經很順利的過去了。目前正在進行兩種工作，一是補習基本科學，二是政治訓練。我在委員會就職那天，提出兩個大希望。第一，希望我們的國民政府切實明瞭，深曉大學的需要，中山大學的重要，因而切實地起來建設本大學。第二，希望各方人士社會民衆起來贊助本大學。要中山大學辦得好，最大的希望，是要財政有計劃，有預算，要有好的預算，這樣才能有力量，才能做設備的工作。不然，雖國內外的好學者都來中大，也不容易辦得好的。本大學過去的情形，外間很多不好的批評，這或

者難免是他們有意來污蔑！兄弟初到此地時，廣州一般人，當他們聽見廣大大中的名字，都表現一種奇怪的感情——就是怕。他們說，中大只會鬧風潮，常常鬧亂子，這顯然是外面誤會本大學的說話。我們都知道這幾個月來，學校的情形，是很可樂觀了。如甄別考試，如學生會選舉，經過的情形都很好。大家都能够把感情抑制下去，受理性支配，在秩序下紀律下努力工作，尤其在選舉中看得出這個現象。外面的批評雖多，只要自己努力，有了錯誤便改正他，人家的批評，是不要緊的。在革命時代，做革命工作的人，對於外間的批評，尤其是不要緊的。往後我們辦學的人，願以全副精神為本大學努力工作。同時希望學生團體，要一致的為全體的進步。為整個的利益而努力工作。時時刻刻，要想把學校弄好，就要時時刻刻一致工作，才可以得到良好的效果。

十六年以後，中山大學更步入欣欣向榮的大道。學期開始，中外學者紛紛應聘來校，學生就正式上課。二月八日中政會決議：派季陶先生為訪日代表，其使命是希望將來兩國國民親善的基礎，築於民族平等和正道正義之上，並將全中國國民熱忱實注的國民革命運動的真正意義，傳諸日本，以期日本國民的諒解。季陶先生二月十四日由滬出發，三月卅一日返國，為時一個半月，演講六十四次。對日本朝野上下公開演說，勸其放棄武力侵略的方針，從事和平的合作者，達四十五次。無如言者諄諄，聽者藐藐。季陶先生十四年著「日本論」時，即謂日本正謀不利於我國，和蘇俄一樣將來都是大患，十餘年後第二次中日戰爭，都沒有逃過季陶先生的智燭。

戴季陶由日返抵上海時，正是中共披猖，寧漢對峙。十六年四月清黨事起，三年多來的混沌局面，得了一次澄清。中山大學校內清除共黨份子四百餘人，佔全校同學十分之二，這是十五年

甄別復試效果的再活。六月季陶先生返校，見到內部安定，校務也上軌道，非常高興。他說：「他從前認為醫科既無藥可醫，法科更是無法無天，現在醫科居然可以醫了，而法科也有法了。醫科待醫，法科無法法兩句話，不到半年就能取消，真是進步很快的。」

季陶先生任中山大學委員長，因兼任中央重要職務，不能常川駐校，原有委員雖粵者亦多，朱駱先生一人負責辦理校務，成績甚優。乃向中政會建議，請將中山大學委員制改為校長期，任朱駱先生為校長。但委員制雖改校長期，仍由季陶先生任校長，朱駱先生任副校長。

諄諄訓誨聲淚俱下

中山大學校長副校長的就任是十六年六月十四日，斯時學校秩序安定，校風丕變。新聘教授，各科都有，紛紛到校任課。外籍學者以醫科的德國教授為最多。計有古底克 (Prof. Dr. Kodik) 內科柏理斯博士，外科馬丁博士，生理巴斯納博士，產婦科沃而博士 (抗戰時尚在北平開業) 等八人。農科方面，也請了兩位德國教授，一位農業家和一位森林家芬次爾教授 (Dr. Vanel)。理科方面，請了德國的葉格爾，瑞士的海姆 (Prof. Dr. Arnold Heim) 教授，及陳可忠、辛樹幟、康辛元、董爽秋、張雲、何衍藩、朱物華諸先生。法科方面新聘的教授更多，我只記得何長 (思敬) 何思源兩先生都是十五年冬到校的。兩位都是接近羣衆，肯和學生打成一片的。不過前者接近 C Y 份子，而後者和所謂「士的」黨同學很好而已。何思源在清黨前後常參加大禮堂的集會，遊行時和我們一樣揮舞小旗高聲喊口號的。

正副校長就職後，季陶先生對學校前途很抱樂觀，他把家眷接來廣州，預備長住。每週對同學有兩次講話，時間是星期一上午 總理紀念晚

以後，和星期三下午，每次兩小時。季陶先生每次的講演，筆者都親聆訓誨，他每次都是用抑揚頓挫的聲調，講他出自肺腑的由衷之語！時常聲淚俱下，筆者曾聞師母鈕夫人言：季陶先生十四年著作「孫文主義哲學之基礎」及「國民革命與中國國民黨」兩書時，簡直是如醉如癡，終日閉戶執筆直書，連飲食都忘記，等書成而後已。初不知其如此，殊令家人徬徨失措，後亦司空見慣，祇得聽之而已。

戴先生講演中最感動人最受同學歡迎的是對於中山大學的希望，他先講各科現狀，第一就是講文科。他說：「在文科方面，我們得到好幾位熱心的教授，做了許多新的設計。對於文科，嚮望甚殷，會有許多意見提出。他認為一個綜合大學的生命在文科，一個民族文化的主動力在文學、哲學、宗教、美術的思想，一代革命的創造力，造端和完成，也在於此。文科關係之重大，不待特別說明，凡是稍有思想智識的人，都能够見到。而且在學術上，文科和任何一科的關係，都很密切。歷史學、地理學、和國文學，這三科的進步和發展，是一切學科建設的基本。尤其中國今天情形，上述三種學問，可以說都是一片荒地，雜生着若干亂草，開拓整理的工作，全在今天努力作起。而且這三種學問，又都是異常困難的，不單是學問困難，並且在思想上，在實際上，常常含着不少的暗礁。越是關係重大，便越是不容易進行，而又不能不勉力作去。我想說一句奇怪的話，就是：『只要真能把文科辦好，革命的前途，便有了八分的把握。』這或者不是一句過分的話。的確，文科的困難和重要，真是如此。並且無論那一科，都可以借材外國，只有文科，當中許多重要科目，是絕對不能借材外國的。我們今後，必須要努力把法科辦好，建國的基本問題才有解決的方法。法科幾個最基本的科目，完全是荒地，而這些荒地，也是絕不能單靠法科

去獨力開發，非和文科通力合作是不行的。我有以二十分的誠懇，希望全大學各教授，認清楚文科關係的重大，諒解文科發展和進步的困難，努力扶助文科的設備和工作。更希望文科的教授，切實負擔起這一個很重大而困難的責任，以戰場上拚死命那種鬥士精神，為中國民族，建設最基本的學問。給中國民族，創造出一個能動的勢力，使一切科學建設，得到活動的新生命。」

十九年一月間，季陶先生返校分別邀集各科教授研討各該科的問題。某日討論法科時，他說：「今天我們討論法科的問題，兄弟除請朱副校長及沈事務主任鵬飛陳教務主任宗南之外，並請文科劉主任奇峯，哲學系崔主任載陽，史學系沈主任剛伯諸先生前來參加。這因為法科的問題，與文科處處有密切關係，今後法科的發展，處處要文科的襄助，所以請文科各位教授也來參加」，這是季陶先生對文科特別重視的一般。(未完)

中外人物專輯(一)

汪公紀等著·定價叁拾元

中外人物專輯(二)

雷嘯岑等著·定價叁拾元

中外人物專輯(三)

王培堯等著·定價叁拾元

中外人物專輯(四)

賴景瑚等著·定價叁拾元

中外人物專輯(五)

李先聞等著·定價叁拾元